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3.01.003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四重维度

李银艳, 张艳萍

(湘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 中国式现代化有别于西方现代化模式, 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既关照中国当代现实又连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产物, 既具有一般现代化的普遍意义, 又因其独特意涵, 对全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道路选择维度看, 它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 从理论创新维度看, 它为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构建提供了中国理念; 从文明发展维度看, 它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力量; 从制度建构维度看, 它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 西方现代化; 中国经验; 世界意义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3)01-0018-07

引用格式: 李银艳, 张艳萍. 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四重维度[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8(1): 18-24.

Four Dimensions of the World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LI Yinyan, ZHANG Yanpi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modernization, is a product of adapting Marxism to the Chinese context. It not only takes full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ut also carries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modernization, both universal and unique,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worl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oad choice, it shares Chinese experience with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t provides Chinese id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pedigree of world modernization the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development, it has contributed Chinese strength to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it offers human beings Chinese solutions to explore a better social system.

Key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western modernization; Chinese experience; world significance

现代化是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所趋, 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愿景。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便身负这

一历史使命, 百年来带领中国人民长期探索实践, 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的现代化”

收稿日期: 2022-12-09

基金项目: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资本批判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价值研究”(CX20220616)

作者简介: 李银艳(1987—), 女, 湖南浏阳人, 湘潭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艳萍(1990—), 女, 湖南娄底人, 湘潭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概念由邓小平首次提出^[1]。进入新时代, 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多个重要场合, 多次提及“中国式现代化”。中共二十大报告中,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等作出了明确界定。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时代课题, 在民族性上体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劲动力和有力支撑, 在世界性上体现为为人类文明的长足发展提供中国智慧, 具有重要世界意义。

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其意义不仅止于中国成为“世界现代化俱乐部”一员的自豪与宣告, 更在于其传递的世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多元观, 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观, 故而, 对中国式现代化世界意义的讨论, 理应成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道路选择维度: 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现代化道路提供了中国经验

旗帜决定方向, 道路决定命运, 走什么样的道路, 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 现代化没有终极答案, 也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是自主原创的现代化新道路、是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立足国情谋发展的成功实践, 它彻底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唯一性, 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 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

(一) 开辟了“自主原创”的现代化新道路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 且主要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领这一历史进程。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 世界各国视西方现代化为鼻祖, 在现代化进程中竞相效仿西方、亦步亦趋。诚然, 资本主义现代化在推动世界历史进程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与之相伴的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给世界带来的灾难亦不容忽视。在现代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 一味效仿乃至完全“西化”招致的后果是难逃沦为西方国家附庸的厄运。中国在近代史上也曾尝试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 但皆因特殊的国情和阶级状况而告失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 “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现实性

和科学理性思维, 激活了支撑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历史的伟力”^[2]。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 开始了领导中国人民走自主原创现代化道路的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的“自主原创”在于独立自主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视角来看, “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何以能成的重要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在其著作中, 多次使用“独立自主”这一概念。早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中, 马克思就肯定了无产阶级独立自主的历史地位; 1868年, 马克思在致施韦泽的信中批评施韦泽等组织的柏林代表大会导致德国工人工会分裂时强调: 对德国工人阶级而言, “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3]。马克思、恩格斯的独立自主思想强调各国无产阶级在进行本国革命事业时坚持独立自主,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基本遵循。独立自主也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正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革命的成功实践。改革开放后, 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进行宏观调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经济特区、在港澳台问题上推行“一国两制”等, 皆是走“自主原创”现代化道路的生动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走“自主原创”道路的重要性, 他指出, “独特的文化传统, 独特的历史命运, 独特的基本国情, 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4]新时代以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实现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双奇迹。横向审视当代西方世界, 看到的是经济发展失衡、政坛恶斗持续等等乱象, “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 由此也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强烈质疑及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的理性思考。中国走“自主原创”的现代化道路为既希望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民族独立的国家提供了全新选择, 对此,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就曾表示, 西方在21世纪面临的挑战表明, 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 而中国赋予“现代化”新的内涵, 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

(二) 开辟了“并联式”发展的现代化新道路

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来看,西方式现代化主要表现为“串联式”发展过程,具体体现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顺序发展,单向度、分时段、渐次推进是其基本特征。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后来者,中国式现代化只能在“时空压缩”背景下推进。在发展时间的压缩上,体现为我们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发展任务的压缩上,体现为要实现“四化同步”而非渐次发展;在发展问题叠加,体现为生产与生态的问题、效率与公平的问题、自由与秩序的问题、发展与安全的问题、文化的变革与文化的守成等等不同阶段、不同性质的问题,在发展过程中集中显露。中国式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既是优势与红利,也是压力与挑战,加之民生需求的高质量、多元化与民生供给的不平衡、不充分矛盾凸显,倘若走西方“串联式”渐次发展道路只会遭遇多重掣肘,西方现代化发展到当前水平用了两百余年,我国要实现赶超发展必然只能走“并联式”发展道路。

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中国走“并联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在早期遭受半殖民地化生存危机、后期遭受西方大国经济政治的双重压迫的客观现实下的被迫反应,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主观诉求下的积极探索。新时代,党中央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协调推进,带领人民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促进“四化同步”,在经济社会等诸多领域实现了赶超发展、跨越式发展。实践证明,中国“并联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固有的渐次发展路径,成功探索出一条压缩、叠加式的综合发展道路,实现了“弯道超车”,为后发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多元化的路径选择。

(三) 开辟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新道路

从“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国之称富者,在乎丰民”到全面小康的社会目标,揆诸古今,

共同富裕始终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的价值追求,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未来社会的重要特征。在其设想中,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制度,通过社会化生产使得人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发展从而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提出,是基于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两极分化的隐忧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多寡主宰经济社会规则,致使财富由广大民众流向资本家,两极分化因此成为西方现代化中无法解决的顽瘴痼疾。

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深具人民情怀,其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在于,它要实现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某部分人、某个阶层、某些利益集团的富裕,而是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既注重效率又兼顾公平,避免了西方现代化模式下的资本奴役、压迫和社会两极分化的问题,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和现代化红利。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人民的需求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跃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打牢发展基础、补齐发展短板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展的历史宏愿和价值皈依。习近平总书记突出强调共同富裕的重要性,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6]。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决将防止两极分化作为重要政治原则,把实现共同富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我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下降到2019年末的551万,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7],仅“十三五”时期,就有5575万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同时,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分配差距,确保现代化建设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由全体人民共享。“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超越了西方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的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下财富向少数人集中的“二八定律”,为解决财富鸿沟、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

二、理论创新维度: 为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构建提供了中国理念

中国式现代化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发展, 为中国和世界现代化理论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 它从理论层面解答了如何应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同阶段的新问题和新挑战, 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领航灯塔、强劲动力。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资本”与“人本”、“生产”与“生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 为世界现代化理论新谱系的构建提供了中国理念。

(一)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资本”与“人本”的辩证统一

西方现代化从资本逻辑出发, 由资本主导社会生产、分配、消费的全过程, 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导致资本的无序扩张,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 这就是增殖自身, 创造剩余价值”^[8]。且资本主义社会往往强化资本而弱化工人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 具体呈现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物的增值”和“人的贬值”, 财富向少数人高度集中导致两极分化日益严重, 其结果是必然激化劳资矛盾而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 据此, 不难得出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注定走向式微的结论。

在正确对待“资本”的问题上, 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明晰了资本的地位与使命, 另一方面又强调“资本”与“人本”的辩证统一。资本不等于资本主义, 资本作为发展的工具和手段, 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改变、调整生产关系, 以公有制为主体扬弃传统的资本逻辑, 从而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西方现代化的根本性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既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资本批判”逻辑, 又扬弃了西方经济学的“资本利润”逻辑, 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相适应的“驾驭资本”逻辑并最终走向“人的逻辑”。中国式现代化在价值旨归上坚持人民至上, 是通过驾驭资本、利用资本为人民创造价值并进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处理“资本”与“人本”的辩证关系, 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可控

范围内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正向功能; 又兼顾公平, 坚决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 确保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 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中处理好“资本”与“人本”的关系贡献了中国智慧。

(二)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生产”与“生态”的辩证统一

工业文明时期的西方世界, 生产力飞速发展, 牺牲自然环境、滥用自然资源换取物质财富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的通病。“人征服了自然, 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他具有关于物质的全部知识, 但对于人的存在之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应该怎么生活、怎样才能创造性地释放和运用人所具有的巨大能量——却茫无所知。”^[9]美籍德国犹太人哲学家埃里希·弗洛姆在其著作《为自己的人》中生动描述了资本逻辑下的物化和人的异化。资本逻辑支配下生产逐利性的无限度与自然资源有限度之间的冲突, 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可调和, 从而引发生态危机。随着国内环境问题的爆发和全球化的发展, 西方国家不得不开始本国的环境治理之路, 将高污染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综观西方现代化进程, 可以清晰看到, 先污染后治理是西方现代化处理“生产”与“生态”关系的普遍逻辑。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10]恩格斯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 并从人与自然和谐角度提出了环境问题的解决之法。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角来看, 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宇宙观,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各得其养以成”“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等无不是辩证生态自然观和生态发展观的体现。诚然,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也走过一些弯路, 部分地方政府将经济增长视为唯一发展目标, 盲目追求GDP数字的增长而忽视了环境的保护,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中共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自然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经济发展观、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观以

及环境就是民生的民生政绩观,引领了生态理念与实践的复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对西方资本逻辑驱使下“掠夺自然式”现代化道路的摒弃与超越。面对新时代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们不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决抛弃轻视自然、支配自然、破坏自然的自然观和发展观,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发展的绿色化、生态化,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产与生态辩证互成,为世界现代化理论中处理好“生产”与“生态”的关系贡献了中国理念。

(三)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既强调物质的本原性位置、基础性功能和决定性作用,又承认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性和反作用。中国共产党人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物质与精神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历史性登场。早在1940年,毛泽东同志便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11]其虽未直接表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却用“经济”“政治和文化”分别指代了“两个文明”的概念。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上首次正式提出“两个文明”,指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12]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要实现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家家仓廪实衣食足;而且要实现精神生活水平提高,人人知礼节明荣辱。历史和现实也向我们反复证明: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或民族就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信仰就是力量,一个没有精神力量、没有文化自信的民族同样难以自立自强。只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促共进,才能实现持久发展、永续发展。

反观西方现代化,其本质是以“物”为核心的主导逻辑,将现代化理解为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和

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创造工业文明和积累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由于忽视精神世界的建设而导致人的物化、矮化、异化,暴露出物质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弊病。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西方“物质增长至上”为价值主导的现代化模式,遵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发展逻辑。百年现代化历程中,我国遵循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全面加强、人民群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同步改善。物质建设层面,我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位巩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1.2万美元,接近高收入国家门槛;精神建设层面,注重发挥价值引领、文化滋养、精神支撑的重要作用,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明显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下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观念、道德理念显著增强。由是观之,中国式现代化是协调“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伟大实践的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理论处理好“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提供了中国经验。

三、文明发展维度: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中国力量

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视域来看,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其所内蕴和展开的文明意涵,生动回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这一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其所弘扬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一) 走和平发展道路,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爱好和平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中华文化历来主张和平,倡导“礼之用,和为贵”“和而不同”“以和为贵,不战而屈人之兵”。“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摒弃了国强必霸的丛林法则和零和博弈的极端思维,坚持永不称霸、不搞扩张的原则,坚守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同时,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等全球面临的共同问题,着意于人类幸福与命运的终极关切,提出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并以此为价值观基础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理念和实践上引领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深度变革。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包容

的文明观，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其现代化路径的探索，倡导文明“各美其美”，呼吁各国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贡献，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

百年来，不论世界局势如何演变，不论自身发展程度几何，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坚定建设者和忠实维护者，从“一带一路”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参与全球减贫到助力世界经济复苏，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到“双碳”背景下的全球节能减排，中国始终以胸怀天下的文明观，向世界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胸怀与担当。中国用和平发展的行动向世界证明，“国强必霸”不是历史规律，而是伪逻辑，国家间合作共赢而非零和博弈、共建共享而非强权独霸的现代化道路是存在的。

（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其必然结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立足于人类文明的演进视野，将中国式现代化提升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也是当代中国对进阶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庄严宣告。近代以来，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开启了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马克思也曾高度肯定资产阶级对于推动人类历史的革命作用，但马克思也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性弊端，指出资本逻辑下的自由、民主、博爱，仍是“物”的观念层面表现，充满虚伪性。综观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社会，依据民主的金钱化让自由竞选成为空洞口号、资本支配下劳动者的自由平等沦为虚伪的自由平等、在人权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等等事实，可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诊断极具科学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需求为价值旨归，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同共进，科学防范并成功应对发展道路上的风险泥淖，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以铁的事实驳斥了“历史终结论”，雄辩说明了人类文明形态没有止境。

综上所述，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新”，在于其

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与超越，消除了资本主义文明内生性的矛盾、弊端和抵牾，既能充分吸收西方现代化文明成果，又能有效避免其负面效应，并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了中华文明新的跃迁，丰富了人类文明的固有范式和已有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植根中华文明沃土上文明建设成果的当代表达，表明在人类文明发展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自主探索，走出了一条新的文明发展之路，标注了人类文明新的高度。

四、制度建构维度：为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中国主体叙事，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世界历史格局，打破了“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体系，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伟力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一）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彰显了党的领导优势

政党政治是人类政治现代化的核心制度，对政治生活的运行起支撑性作用。西方在政治现代化过程中，多数实行的是轮流坐庄的两党制或多党制。这类政党制度虽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显著弊端，如多党内耗导致执政能力低下、金钱选举暴露民主虚伪面目、政局动荡引发经济社会混乱等。自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遭遇国家困境、社会困境、文明困境。在救国救民实践中，知识分子开始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探索，先后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戊戌变法”，和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等救国方案轮番出台，但均以失败告终，人民仍身处水深火热的境地。五四运动后，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入与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孕育并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在扬弃中创新，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避免了西方多党制下政党纷争、互相倾轧招致政治动荡的吊诡泥淖，又跳出了“一党制包打天下”缺乏监督的历史困境。

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领导核心地位。“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3]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党带领人民在长期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近代中国的历史与实践亦证明拥有先进政党的领导是现代化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其指导思想和性质宗旨而具有其他任何政党无法比拟的先进性，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政治立场和价值追求。在现代化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开创者、领导者。在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以整体思维、系统思维谋划国家发展，将有限资源用于精准脱贫、乡村振兴、生态建设等关系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要事上，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基础薄弱、区域发展差异显著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有效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推动现代化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多党合作”，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是一种新型政治制度，为人类探索更好的政党制度、推动政治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方案。

(二) 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前提和先决条件。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和成就表明，社会主义事业及其前途是光明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焕发的强大生机活力，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伟力，极大提振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道路自信。

纵观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巨大挫折而急转直下、走入低谷，“中国崩溃论”“社会主义失败论”“共产主义渺茫论”等思潮泛起。面对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始终坚信“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14]，以科学社会主义引领并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中国焕发出蓬勃的生机。我们从温饱不足迈步到全面小康，从经济版图的边缘位置跃升到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从世界经济的旁观者成长为全球经济的贡献者、新引擎；我们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不断扩大的‘朋友圈’，标注了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高度”^[15]。中国式现代化创生的此类历史性变化、开创性成就以不可驳斥的事实彰显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磅礴伟力。社会主义制度因其优越性，使历史的天平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中，开始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偏移。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其不仅改变了中国自身命运，也深刻影响了世界格局和价值取向，从道路选择维度、理论创新维度、文明发展维度、制度构建维度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理论以及更新文明形态、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理念、中国力量、中国方案。当然，中国式现代化倡导的，并非中国发展道路的国际化，而是世界发展道路的多元化，是文明的“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面对当代西方国家经济困境、民主乱象、话语霸权，非洲国家普遍落后、止步不前、国际失语的全球现状，中国式现代化因其创新性、引领性、包容性彰显出独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4.
- [2] 臧峰宇. 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2022(7)：47.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59.
- [4] 习近平. 论党的宣传工作[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7.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69.
- [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71.

(下转第86页)

- 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1, 24(3): 28-41.
- [9] 温世扬.《民法典》合同履行规则检视[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0(6): 6-17.
- [10] 我妻荣.我妻荣民法讲义IV:新订债权总论[M].王焱,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223-235.
- [11] 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解读:上册[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213.
- [12] 朱广新,谢鸿飞.民法典评注·合同编通则(1)[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20: 490-491.
- [13] 田高宽贵.第三人清偿(代位清偿)[M].张韵琪,译.东京:信山社, 2019: 20-25.
- [14] 孙森焱.民法债编总论:下册[M].台湾:三民书局, 2017: 1009.
- [15] 王轶.代为清偿制度论纲[J].法学评论, 1995(1): 19-24.
- [16] 王利明.论第三人代为履行:以《民法典》第524条为中心[J].法学杂志, 2021, 42(8): 1-16.
- [17] 崔建远.合同法[M].6版.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6: 212-214.
- [18] 郑玉波,陈荣隆.民法债编总论[M].2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398-399.
- [19] 黄立.民法债编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656.
- [20] 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0: 807.
- [21] 施建辉.债务加入研究[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2010, 47(6): 139-147.
- [22] 潮见佳男.新债权总论[M].2版.东京:信山社, 2008: 138-141.
- [23] 陈雄,赵芸,赵津萱,等.论我国“婴儿安全岛”的法律保障[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1): 61-70.

责任编辑:徐海燕

(上接第24页)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2021年4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1: 59.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69.
- [9] 埃里希·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 1988: 25.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4.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 666.
- [1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22: 22-23.
- [13]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 16.
- [1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321.
- [15] 人民日报评论员.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N].人民日报, 2022-10-4(3).

责任编辑:陈璐